

隐喻经纬的编织和隐喻的语篇性*

四川外语学院 侯国金

摘要: 隐喻产生的机制是隐喻化,其反向语用机制是“反隐喻化”,任何隐喻都要经历“隐喻化—去隐喻化—反隐喻化”的动态过程。在讨论隐喻和意象、象征等的关系基础上,以若干语例及其分析着重阐述了散文和诗歌的隐喻网络的编织和解读,并认为隐喻尤其是活喻通常用于隐喻集或隐喻链,其生成与解读都得求助于所在或所归的集/链。文章强调了隐喻的语篇性和相互依赖性,即一个隐喻网络的经纬线以及左右穿梭的隐喻斜线,或者说,隐喻网络中的“经、纬、斜”线隐喻,具有不同程度的语篇性和相互依赖性,而且,活喻的语篇性和相互依赖性高于死喻。

关键词: 网络;语篇性;意象;象征;隐喻集/链

作者简介: 侯国金,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语用学研究。电子邮箱:
nationelf@126.com

1 隐喻化和反隐喻化

“隐喻像个私生子,不好不认,也不好认。”(Blasko, 1999)由于隐喻无所不在,俯拾即是,充斥着六大级阶[语素、语词、短语、语式(即构式)、语句、语篇]——姑且称为“六语级阶”,而且,每个级阶本身都可以是一个隐喻,如语素隐喻、语词隐喻、短语隐喻、语式(即构式)隐喻、语句隐喻(也叫“陈述隐喻”)、语篇隐喻。假使我们把重点锁定在语素和语词这“二语”的隐喻上,用于更高级阶(其他“四语”)的隐喻归根结底也是语词隐喻,加之隐喻是语言能力更是词汇能力的关键,这就使得“隐喻能力”显得异常重要,因此,词汇语用学必须给予一定的解释。我们主要讨论语词层级的隐喻,以及其他各级阶隐喻的语词。

我们认为,死喻也罢,活喻也罢,都要经历“隐喻化—去隐喻化—反隐喻化”过程。“隐喻化”[metaphori(cali)zation]指的是一个语词或其他级阶的符号作为能喻来喻指某所喻,从而获得隐喻意义或效果。简单地说就是发现跨范畴相似点从而构建一个隐喻(严世清,2000:73)。我们经常以非生命的物体(如花草)或非

人类生命体即飞禽走兽和昆虫类来喻指人类自身,并将其一定的民俗语义映射到人自身,取得生动的语效。例如,我们把女人比作“花”,而把一个漂亮女生称为“校花”(不是指学校花圃里的花朵),这是“‘夸张性’隐喻(化)”。“有好果子吃”喻指没有好结果(不是指真的有什么好水果吃),此乃“‘反讽性’隐喻(化)”。“去隐喻化”[de-metaphorization]指隐喻的标记性下降,认知价值降低,更谈不上多高的修辞价值,几乎可以不作为隐喻处理了,而是反过来成为构成日常语言的一分子,即“纯符号”。也即,隐喻即将退化为非隐喻了,或者说,隐喻没有原先那么鲜活了,“沉睡”了,不像隐喻了,或者不算隐喻了,或者干脆堕为“非隐喻”。“去隐喻化”也叫作“隐喻的固着”[entrench(ing)]。上面“校花”类拟物类隐喻,一旦固着或“去隐喻化”成“死喻”,也就不再有多少隐喻义了,直至彻底地“去隐喻化”,以至于产生一个新的“词位”(lexeme),至少是产生一个新的“义素”(sememe)。

不难看出,造字或字词层面的隐喻多数属于死喻范畴,其隐喻性(metaphority, metaphoricalness)临近消退、腐蚀、消失以至于缺乏修辞价值。短语、构式、语句(尤其是谚语类)等的死喻也大致如此。换言之,多数死喻一般不作为(修辞学的)隐喻来对待,只是在认知框架里有时作为“睡喻”(“死喻”的别名)来研究语词的理据性。例如,汉语的“吃酒、吃粮票、吃亏、吃了两张黄牌、通吃、口吃、白吃、吃得开、吃不消、(船)吃水很深、吃了两吨货”都是靠“吃”字组建的死喻词组、短语、习语等,鲜有修辞价值。更高级阶的“吃”死喻,如语句死喻:“吃一堑长一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你是干什么吃的”等等,其修辞价值略高,但是顶多算半死喻。有趣的是,词典(编纂)学和语言教学法(尤其是对外汉语教学法)对其(尤指较低级阶)隐喻理据性的考究却不乏实用(使用)价值,因为它能简化记忆,提高效率,搞活教学。

“反隐喻化”[anti-metaphorization]是指一个隐喻式,通常是活喻,在一定语境里,突然临时地“返璞归真”,反其隐喻之道而行至“非隐喻”的字面意义或刻意用法之一端,在这种情况下,所用的那个“隐喻”虽无隐喻之名(不用作隐喻),却不失隐喻之实[人们能激活其联想意义即其常规的隐喻(随意)用法]。不难看出,“反隐喻化”往往能产生双关的语效。请看以下两例:

- (1) 老鼠上秤钩——自己称自己。
- (2) 孔夫子搬家——尽是书(输)。

例(1)和例(2)作为歇后语在默认的语境里就是规约的隐喻用法:例(1)是讽刺某人往自己脸上贴金,自己赞扬自己;例(2)则是说某人在赌桌输钱或在赛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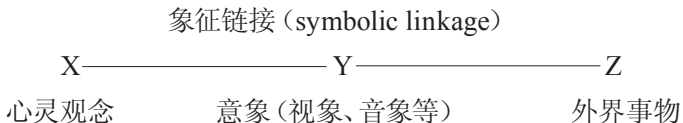
上输球。但是,假如用于非隐喻语境框架里就不是隐喻了,它们就是“反隐喻化”。例(1)若真的是说老鼠,例(2)若真的是说某人搬家时有很多书要搬走,就是反隐喻化,取其多少带有双关语效的随意用法。需注意的是:第一,就隐喻个案而言,这样的“反隐喻化”不是必然发生的,而是偶然发生的。第二,“反隐喻化”的语效不局限于双关。例(1)还兼有讽刺(sarcasm)的语效,假如身边有人(或者受众)姓“舒、许、徐”中的一个,还有另一层双关。例(2)除了双关语效还兼有自嘲(self-satire)、夸张(hyperbole)等语效。再假如若提及某孔姓老教师搬家的情况,就增添了一层双关语效。第三,隐喻(通常为活喻)是隐喻(化)用法还是反隐喻化用法,最重要的判断标准是语境线索或语境假设(集)[contextual assumption set(s)]。这些隐喻式逐渐固着成为习语即崭新的词位——人们不再单独记忆和使用它们的合成成分,而是格式塔式或整合式记忆和使用它们,因为习语的意思(也可叫作“构式意义、构式效果”)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这里的“一加一”远远大于“二”。不过,正如这些表达可以通过拟物来实现“隐喻化、去隐喻化”一样,在一定语境里,施喻者(言者、作者)受到较高语用意识的驱动,为了实现某一有别于相关隐喻和/或“固着隐喻”的意思和语效,完全可能,或者说完全可以“反隐喻化”地“有一说一,实事求是,call a spade a spade”,从而使得“固着隐喻”不那么固着,乃至解体或解构为非隐喻式,并附着着难免的双关语效——因为隐喻化过程在先,反隐喻化过程在后,前者对后者的“后摄”作用或多或少赋予了它双关语效——不论施喻者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也不论对施喻者来说是合意还是非合意的。

不过,隐喻化和去隐喻化绝非总是丁卯分明或互相独立的现象,其间界限有时是模糊的、互动的(严世清,2000:81—82)。下面不再区分上述三种过程,我们要阐述的是语篇中如何建立隐喻网络。先看看隐喻和意象以及象征的关系。

2 隐喻和意象及象征的关系

狭义的“诗学”(poetics)多从诗性隐喻入手研究诗歌,而诗性隐喻与意象和象征紧密相连。先说意象(image/imagery)。“意象”大约是“心灵的图像(mental picture)、意念中的图像、形象思维”,因此人们可以“隐喻化”地“立象尽意、得意忘形、意象尽足、意象欲出,造化已奇”(张沛,2004:112),也即,隐喻化是化象为意,化意为言。精当的隐喻往往意味着“隐喻化”的出神入化,或者说,意出于言,象形于意,且为“精当的意象”[Wellek,1983(1981):151]。“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无诗矣,变象易言,是别为一诗甚且无诗矣。”(钱锺书,1979:12)意象派说意象是“理智与情感在刹那间复合的体现”^①,这样几乎就

把“意象”的外延扩大到艺术或美本身了。马致远(约1250—1321)的《天净沙·秋思》表面上看似无关的名词堆砌,其实是十五种左右不同而关联的意象群(包括标题)。一首诗歌汇集其全部相互撞击的意象为“单一全体”(a single universal body)(Frye *et al.*, 1957: 125)。当然,诗学所讲的意象,并不是也不贪求客观准确的“图像化、实体显现”,而求“超然关照理念”^②的“解悟模式”。从刻意用法到随意用法的寓意用法,诗歌的意象可以分为七类:“装饰型(decorative)、沉潜型(sunken)、牵强/浮华型(violent/fustian)、基干型(radical)、深入型(intensive)、扩张型(expansive)、繁密型(exuberant)”(张沛, 2004: 114—115)。里奇(Leach, 1976)的看法十分新颖:意义、视觉和声音的意象是“外界事物”和“心灵观念”的交汇点,而意象和“外界事物”的关系是象征[symbol(ic)]关系。如图所示(改自张沛, 2004: 116):



X—Y的联系是本质固有的, Y—Z的联系却是隐喻性的象征, 语言社会约定俗成之为语符(同上)。汉字“象征”拆开来是“象”和“征”, 前者源于“大象”的“象”, 后来逐渐(喻)指“天象、征象、想象”^③, 正所谓“象也者, 像也”(《易传·系辞下》), 近似于当今的“图像、影像、意象”, 而后者近似于“表征”。英语的“symbol”源于希腊语的“symbolon”, 原指换喻或隅喻式的部分—整体关系, 现指“以类似对应物表现另一事物”(张沛, 2004: 117)。象征具有认知和思维价值, 因其彰显真理的功能几乎可以被称作“认知型隐喻”(cognitive metaphor)(同上: 118)。象征对于文学的意义自不用说。张沛(2004: 119)说“‘象征’生于‘惊奇’而终于‘暧昧’”, 有时比隐喻还显得崇高。他援引爱尔兰著名诗人W. B. 叶芝评论R. 彭斯的诗句[例(3)]所说的话:“这可以说是一种隐喻的写法, 但称为象征会更恰当些, 因为隐喻往往失之浅显而感发不足, ……但它成为象征时就是精妙绝伦的隐喻了, ……这时人们可以通过隐喻来发现象征为何物。”(引自张沛, 2004: 119—120)

- (3) The white moon is setting behind the white wave,
And time is setting behind me, O!

象征具有“重现与持存”的特点：意象激发一次是隐喻，而重复激发（“表现与再现”）就是象征。西方的象征往往具有宗教意义，而中国人的经典/古典象征体现在君臣关系上，如“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譬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王逸，《楚辞章句》，转引自张沛，2004：120）。现代人熟知的象征，有象征着爱情忠贞的玫瑰，象征着意志坚强或万古长青的松柏。由于隐喻的狭义象征性和语言符号的广义象征性，隐喻化也就意味着象征的抽象性、跨域性、模糊性——这正是现代隐喻学的“隐喻性”。

3 散文的隐喻网络

一个幽默语篇尤其是一个文学语篇，无疑是一个隐喻网络，死喻（“去隐喻化”的结果）的经线和活喻（“隐喻化”的结果）的纬线纵横交织的网络。该网络包括了处于“去隐喻化”过程之中的半死喻。如果动态地考察，我们可以从一个语篇（尤其是鸿篇巨著）看到诸多隐喻（式）的“隐喻化、去隐喻化、反隐喻化”的动画全景。以一般汉语语篇为例，它自然会有若干活喻以及很多（越深挖越多）半死喻和死喻。亚洲语言尤其是汉语“神奇而不可思议地图形化”，“充满着讽喻、比拟和隐喻”（张沛，2004：130）。弗莱（Frye，2002：56）也说像汉字这样的表意文字就是隐喻，是“并置意象”的“隐含隐喻”，而解读汉字离不开“隐喻性思维飞跃”——为此我们没有理由不佩服那些测字先生。文学，尤其是诗歌语篇更是隐喻的天堂。

所谓隐喻网络，指的是施喻者在一个语篇里不断使用有关联的隐喻，构成一个隐喻集（metaphor set），或隐喻链（metaphor chain）——正如关于某个话题的语篇中的相关词汇构成一个词汇集或词汇链一样。把人生比作旅行或下棋的隐喻，索绪尔把语言（系统）比作棋局的隐喻，等等，都可算作最奇妙的隐喻集吧。假如人生一旅行之喻能够成立，那么，有数以百计的人生事件都可以一脉相承地坚持旅行的寓意（或喻义）。人生目的是目的地，生活费是差旅费，朋友和配偶是旅伴，人生之初是起点站，人生之末是终点站（彼岸），等等。假如人生是棋局的隐喻能够成立，也有很多“批发”的寓意/喻义构成一个隐喻集或寓意集。人生和下棋都是游戏，都有规则，都有玩伴和对手，都有合作和竞争，都有输赢成败，等等。语言一棋局之喻基本同理。语言系统和棋局（或一局棋）都有系统性，都有层次性，都有原则和规则，具体运行都有目的（性），等等。由于这些和更多的共同特点（喻底），正如我方少了一颗棋子可以让对方这颗棋，也可用石头、硬币、纸团甚至空白代替，语言也是如此：我对你说的一句话里的某个词语的空白可以用应该用的词填充，还可以用同义词甚至反义词代替——前者是意思相当，后者是反语。自然也可以省略（即使算口

误、笔误)。每颗棋子的功能取决于它在该系统里的定位或地位,同样,每个词语的功能、意义乃至概念也取决于它在整个语言系统或具体语篇和语句系统里的位置。总之,这三个隐喻集个个都是隐喻网络,牵一发而动全身。请看几例数字类歇后语,它们各自为歇后语,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同时从一到十构成了另一个歇后语隐喻网络:

(4) 一根头发系石磨——千钧一发;二齿钉耙——有两下子;三根手指捡田螺——十拿九稳;四两棉花十张弓——从何弹(谈)起;五脏六腑抹蜜糖——甜透了心;六月天穿皮袍——不是时候;七斤面粉调三斤糍糊——糊里糊涂;八字写了一撇——差一半;九牛一毛——微不足道;十点才到九点六——差点四(事)。

歇后语的前半部分往往是来自历史事件或社会生活实践,对人们有启迪和教育意义。后半部分则是通过逻辑、语义、语用或谐音等手段所做的关联性评价,属于歇后之语,故名“歇后语”。这个“歇后语”往往是点题之句,跟实际交际存在更大或直接的关联。如例(4)的“三根手指捡田螺”只是一个社会实践片段,似乎只是描述了一个自然的工作场面。歇后之语“十拿九稳”则是点题之笔。这个“十拿九稳”肯定跟捡田螺没有关系,而是说某人做别的什么事时“十拿九稳,胸有成竹”。也即,该歇后语是借“三根手指捡田螺”来喻指或形象生动地代表“很有把握”,求的是语效。还有,例(4)的数字歇后语跟数字都不一定有关。从一到十,只是创作者或使用着借用这些数字的联袂来取势达效罢了。

我们发现,就算不用于同一语篇,(歇后语)隐喻也可构成无形的网络,这是因为历史文化纽带或主题性(topicality)使然。例如,三国人物因其历史原因和文学艺术的魅力而产生了很多歇后语隐喻,它们之间互有联系。与诸葛亮有关的歇后语隐喻至少有三十多条[如例(5)]。与曹操有关的歇后语隐喻也很丰富,单说曹操杀人的歇后语隐喻就有五条[如例(6)]。

(5) 诸葛亮过长江——胸有成竹。

(6) 曹操杀吕伯奢——多心害死人。

在我校去年的教师节大会上,某教师作为教工代表讲话(略),充满了隐喻,且全部隐喻都分属教师职业和教师节这两个语义场,也即是由这两条经纬线编织起来的隐喻网络。如:

- (7) 国运兴衰(死喻), 系于教育(死喻)。
 (8) 因为有了我们在静静的课堂上播洒智慧的阳光(半死喻)。
 (9) 因为有了我们在教育的沃野上(半死喻) 翻动犁铧(活喻)。

像多数汉语发言语篇, 这个七百多字的发言的结构是“启、承、展^④、转、合”。除了“启”和“合”, 其他部分完全是隐喻的堆砌。初步统计, 有60个隐喻: 46个死喻, 14个半死喻。从隐喻的性质可以看出, 该语篇是八股文式的语篇, 用该发言人的话说: “昨天晚上上网下载的, 完成任务而已。”另外, 以上没有涉及隐喻的其他分类标准, 如语言学分支、词类、结构、哲学性质等, 只是根据上位隐喻的下位特点和鲜活程度来初步说明的, 而且也没有探究该词汇级阶的深层词义—构词理据(的死喻), 如“人才”(死喻), “放心”(死喻)。假如施喻者提高自己的隐喻能力, 那么, 除了利用上述隐喻模因(死喻、半死喻)以外, 还能创造若干属于自己的活喻——“个性隐喻化”, 从而使得该语篇更具活力。

4 诗歌的隐喻网络

散文语篇离不开隐喻, 诗歌语篇更是隐喻的天堂。或者说, 没有隐喻就没有诗歌。诗歌隐喻有时就干脆叫“诗性隐喻”, 此乃上述“个性隐喻化”的产物。诗歌隐喻是违反科学和常识的“非逻辑融合”, 把“不和谐者、相互矛盾者”焊接在一起^⑤。诗歌的隐喻让受众看到了什么? 是意思? 是含义? 是语效? 是意象? 抑或是象征? 张沛(2004: 146—159)通过研究发现, 除了必然表达的意思和含义等, 主要的是“仿真之境、象外之境”——相对于“隐喻性真实”(vérité métaphorique, metaphoric verity: Ricoeur, 1975: 279, 297, 309—310)。这里的“象”就是客观世界的相关事物, 而“境”相对于“意境、境界”, 不拘泥于客观的“六境”(眼、耳、鼻、舌、身、意所能感知的对象, 也叫“六根、六识”), 更不圈囿于情景语境。

迪恩(Deane, 1995)阐述了爱尔兰诗人W. B. 叶芝的诗歌“The Second Coming”(《基督复临》, 原文略)的隐喻结构。他用莱柯夫(Lakoff)、约翰逊(Johnson)、特纳(Turner)^⑥等的隐喻观分析全诗, 发现该诗的意义是由依赖于中心—边缘图式的各种规约隐喻形成, 它们互相结合, 诠释了一种文化理想。该诗利用上述隐喻创造了强大的意象——社会“非中心化”(decentered), 即边缘化, 以及社会“重新中心化”(recentered), 以恢复其颠倒的社会秩序。

根据莱柯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 1980)等的观点, 普通语言满载隐喻, 而文学隐喻(literary metaphors)由规约的思维模式精制而成。隐喻作为认知

过程,其语言表达确保了日常和诗性语言都建立在共同的概念基础(conceptual base)之上。迪恩运用上述隐喻观分析叶芝的这首诗,发现其隐喻观行之有效。该诗的多数隐喻都是基本概念图式(conceptual schema)的变体,如整体一部分关系、因果关系、中心(center)一边缘(periphery)关系,及其这些关系的图式,诗歌的威力大部分源于一系列诗性意象(poetic images)的连贯和共鸣(resonance),这些意象都是运用关于社会和道德中心(性)(centrality)的规约隐喻的结果。

迪恩重点讨论了作为基础意象图式的中心一边缘关系图式:感知中心一边缘,中心部分一边缘部分,动态中心一边缘,社会或社交中心一边缘,道德伦理中心一边缘,政治外交中心一边缘,等等。以感知中心一边缘以及中心部分一边缘部分为例,我们以身体为中心,以能感知的身边的事物为边缘。就身体而言,躯干为中心,四肢及其他为边缘。中心可视图形,边缘可视为背景。人的生命离不开人体的中心,舍去边缘只是残疾而已。这也能解释人由己及人的认知思维方式。一个人,一棵树,一座房子,一所学校,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都有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除却诸如此类的中心一边缘知识我们无法认知,无法思维,也就无法正常言说。再来说说动态中心一边缘。作者说,中心和边缘的二分法对运动功能的认知也是很重要的,与中心的距离和离心力息息相关。例如,一个包裹,若贴着胸口抱着就很安稳也很省力,而假如单手抓举至一臂之遥就不牢靠也较吃力。也即中心意味着安全、省力,反之,边缘意味着危险、吃力。作者提到叶芝诗中的放鹰狩猎者(falconer),说他就是一种动态或运动中心,而围绕他运行和劳作的鹰则是边缘——当然此时还是无标记的情况。作者把社会或社交的中心一边缘、道德伦理中心一边缘、政治外交中心一边缘等统统归并到基于以上基本中心一边缘图式的“规约隐喻”图式。简单地说,社会被看成一个物体,有中心和边缘,人人有自己的位置(家宅、职位、地位等)。假如某些人或阶级是中心,那么其他的人或阶级就是边缘。处于中心的人或阶级有能力治人,后者治于人。美德之所以为美德在于能维持道德伦理的平衡,因此人要坐稳江山或站稳位置,就要正直诚实,而且要提防绊脚石。很明显,中心容易平稳,而边缘则很动荡。日常语言里常有这样的劝诫语:“要走正道,不要走邪路”,“做人要随众,不要标新立异”,“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等等。政治外交中心一边缘的隐喻略有上面所说的两类的特点。有说法为证。我们常把恐怖分子说成“极端分子”,也即他们属于边缘。他们的极端行为只能在政治中心腐蚀和腐败的情况下取得成功,其成功只能巩固或加强极端左翼势力或极端右翼势力。

迪恩在中心一边缘的论述后终于把我们带到诗歌的“中心(化)隐喻”(死喻、半死喻)以及“去中心化隐喻、边缘化隐喻”[(比较而言算)活喻]。该诗运用了基督教关于“天启”(apocalypse)和“基督复临”的意象,作为一种讽喻或寓言

(allegory), 描绘了一战之后欧洲的景象——黑暗可怕的黑势力即将降临。诗中的描写跟基督教社会的基督没有多大关联或相像,但是它符合诗人的看法:某种不可名状的东西即将来临并代替基督教。这个东西就是“狮人兽”,不论叫“manticore”还是叫“sphinx”,1904年就萦绕在诗人脑际。根据迪恩(Deane, 1999)的观点,这首现代派诗歌无非是对中心—边缘(图式)隐喻种种生动而有创造性的演绎,具体表现为中心化、去中心化、边缘化、再中心化等及其相关隐喻群的网络。该诗反映了诗人对一战后世界混乱的无助担忧。“stony sleep”这个短语据说是来源于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神话诗歌。布莱克写道,尤来森(Urizen)不能忍受自己发动的战争而倒下了。为了躲避复仇兄弟伊特诺斯(Eternals)的怒火,他为自己打造了一个石宫。“But Urizen laid in a stony sleep / Unorganiz’d, rent from Eternity.”在这个所谓的“stony sleep”中,尤来森作为沉沦之辈经历了七个生死挣扎的世纪,直到再次现身为埃及的狮身人面像(兽)^①。

下面我们按诗行的次序粗略列举一下该诗的隐喻。我们发现诗人使用了大量的死喻和半死喻。在诗人的特殊隐喻网络里,这些死喻和半死喻在一些活喻的刺激下得到了第二次生命,从而再次焕发生机。按在原文出现的先后次序排列如下(同一诗行的隐喻用逗号隔开):

(10) gyre(死喻); falcon, falconer(活喻,象征类隐喻); things fall apart(半死喻), the centre(半死喻); mere anarchy(死喻), is loosed upon the world(活喻); The blood-dimmed tide(活喻), is loosed(半死喻), everywhere(死喻,夸张类隐喻); the ceremony of innocence(活喻), is drowned(半死喻); the best(死喻,转喻类隐喻), lack all conviction(死喻,夸张类隐喻), the worst(死喻,转喻类隐喻); are full of passionate intensity(活喻,夸张类隐喻); at hand(死喻); t/The Second Coming(出现两次,死喻), at hand(死喻); vast image out of Spiritus Mundi(死喻,典故类隐喻); troubles my sight(死喻), somewhere in sands of the desert(半死喻); A shape with lion body and the head of a man(死喻); A gaze blank and pitiless as the sun(活喻,明喻类隐喻); is moving its slow thighs(半死喻,拟人), while all about it(死喻,夸张类隐喻); reel shadows(死喻), the indignant desert birds(死喻,拟人和象征类隐喻); the darkness drops again(死喻); that twenty centuries(死喻,夸张类隐喻), stony sleep[半死喻,(文学)典故类隐喻,移就类隐喻]; were vexed(死喻,拟人类隐喻), to nightmare(死喻), a rocking cradle(死喻,象征类隐喻); its hour(死喻,象征类隐喻), come round

(死喻, 拟人或拟物类隐喻): Bethlehem[死喻, (宗教)典故类隐喻]

诗人无意也无力区分死喻、半死喻和活喻。有的隐喻(主要是死喻)是诗人无意识使用的(可叫“无意识隐喻”),有的隐喻则是他有意识(在很高的语用意识的驱动下)创生的(可叫“有意识隐喻”)。我们这里的区分也是相对的(不同的人可能会觉得有些死喻不那么“死”,而有些活喻又不那么“活”),我们甚至不可能穷尽其隐喻,因为更泛的泛隐喻观会发掘更多的隐喻(式)。关键是,诗人的这个语篇就是一个由各种隐喻构筑起来的神奇意象/象征性语篇:每一个隐喻构建一个或几个意象/象征。至于诗人的隐喻是否具有很大的原创性,我们认为是,虽然不少诗歌的活喻并不是很多。根据泛隐喻观(如Lakoff & Turner, 1989),日常语言具有深厚的隐喻性(deeply metaphorical),而诗歌语言具有深厚的规约性(deeply conventional)。他们说,即使诗歌语言的隐喻表面上具有创造性,隐喻的诗性运用(poetic use of metaphor)也很少真正具有原创性,因为诗人往往运用规约隐喻,只是付之以非规约的使用(unconventional use)。例如,人们规约地把人生比作旅行或旅程,而像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这样的诗人无非是巧用了该规约隐喻,如“The Road Not Taken”。他们想强调的是隐喻的普遍性,却难免有轻视诗性隐喻的原创性之嫌。

5 隐喻语篇性讨论

当我们学习或研究一个隐喻时感觉它仿佛是天生或自生的,仿佛它是一个孤立的隐喻,然后可以和其他隐喻“合股”。其实,隐喻不是自生的,也不是独(立)生(成)于一个语词或语句。语言使用者是基于隐喻性语言的土壤根据一定的交际信息和语境信息生成一个又一个隐喻集或隐喻链。人们看到的一个隐喻一定是某个语篇里的隐喻,是一个隐喻集中的一分子,一个隐喻链的一环。生成隐喻如此,理解隐喻亦然。也即,若脱离隐喻集/链,隐喻便是无解的,至少是少解的,对其解读是不全面、不生動的。

上文(第1节)说到语素隐喻、语词隐喻、短语隐喻等各个级阶的隐喻,假如我们研究或教学隐喻时按照上述类别进行,势必事半功倍。假如按照隐喻的鲜活度,我们发现:1) 初创隐喻、创新隐喻、创喻(original metaphor); 2) 新造隐喻、新喻(newly-invented metaphor); 3) 活喻、鲜活/活泼隐喻(live metaphor); 4) 活性隐喻、鲜活隐喻(active metaphor); 5) 近期隐喻、新喻(recent metaphor); 6) 库存隐喻、俗喻(stock metaphor); 7) 磨损隐喻(worn-out metaphor); 8) 睡眠隐喻(dormant metaphor); 9) 陈旧隐喻(cliché metaphor); 10) 半死(隐)喻(half-dead

metaphor); 11) 衰亡隐喻、熟滥隐喻 (dying metaphor); 12) 四分之三死喻 (three-quarter-dead metaphor); 13) 熄灭隐喻、死亡隐喻 (extinct metaphor); 14) 死(隐)喻 (dead metaphor); 15) 化石隐喻 (fossilized metaphor); 16) 僵死隐喻 (stone-dead metaphor), 等等(张沛, 2004: 265; 赵彦春, 2011: 259)。若按类别处理, 其效果远胜各个击破。此外, 我们根据不同的“分类参数标准”, 可以把隐喻分为“非语言隐喻、语言隐喻”。根据理论来源可分为“来自汉语界的隐喻、来自外语界/外国的隐喻”。根据语言学分支, 可分为“形态隐喻、语音隐喻、句法隐喻(即语句隐喻)、语法隐喻、语用隐喻、语篇隐喻”等。根据词性可分为“名词性隐喻、动词性隐喻、形容词性隐喻、副词性隐喻、介词性隐喻”等。根据结构可分为“本体、喻体、喻底共现的隐喻, 本体和喻体共现的隐喻, 喻体式隐喻, 本体式隐喻”等。更可按照任何主题[如动物名隐喻、植物名隐喻、转隐喻、实喻、虚喻、关于男欢女爱的隐喻、关于珍惜光阴的隐喻、含“心”字的隐喻、人名成语隐喻、(四川)方言歇后语隐喻, 《红楼梦》的隐喻, 莎士比亚剧本的隐喻, 等等]进行分类和处理。

以上任何分类都是把相关的隐喻作为一个隐喻集/链来处理, 这样一来, 一个隐喻集/链和另一个/些隐喻集/链就可能有一定的关联, 连通起来就构成了条条纵横交错的经纬线, 它们编织出一个庞大的隐喻语篇网络。俗语云:“独木不成林。”同样, 独(隐)喻不成语(篇)。语言(篇章)离不开隐喻(泛隐喻观), 指的是离不开隐喻集/链, 以及更多的隐喻集/链的经纬, 以及由它们编织起来的隐喻网络。

下面单说隐喻对话篇的作用。根据德·博格朗和德斯勒(Beaugrande & Dressler, 1981), 一个合格的语篇至少要满足下列七个标准: 衔接、连贯、信息性、可接受性、目的性、情景性、篇际性(转引自刘兵, 2008)。隐喻在语篇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因为语言的语篇性(生成于语篇, 也生成语篇), 因为语言的语境(依赖性), 还因为语言的隐喻性(根据泛隐喻观), 学界早就注意到了隐喻的语篇性, 当然主要是关注其语篇构建功能。例如, 莱柯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 1980[®])、束定芳(2000: 87—89)、胡壮麟(2004: 153—165)、魏在江(2006, 2008)、刘兵(2008)、张玮、张德禄(2008)等, 从不同视角, 以不同旨趣, 这样或那样地论述了隐喻的连贯功能、语篇组织模式、文体功能等。刘兵(2008)说“隐喻的语篇性表现为衔接与连贯、信息性、目的性等因素”, 而“文学语篇往往利用隐喻来建构文本的框架, 使语篇产生衔接与连贯”。张玮、张德禄甚至称语篇为“隐喻性语篇”(metaphoric text)。本文的“隐喻网络的编织和解读”的兴趣不在于此, 而在于宏观地阐述隐喻的集合性或链条性, 一个隐喻集里的隐喻, 或者说一个隐喻链条上的隐喻, 彼此依托, 互相依赖, 而且其互相依赖性还具有层级性。一个隐喻集/链和另一个隐喻集/链也有此类关系, 只是其间的关联度不是恒定的, 而是动态的。

同一个语篇里的众多隐喻构成一个集/链,其间的关联自不必说,但其关联度却不是均等的。这与一个语篇的语义层次有关,属于不同语义层次的隐喻其关联度自然就稍弱。另外,语篇有大小之别。《战争风云》、《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巨幅语篇都具有很多章回和次主题,全文的隐喻分属不同的章回或次主题,其关联度自然不能简单看待。假如某个语篇介绍《三国演义》的歇后语时列举了很多,那么它们都是这个歇后语(讨论)语篇的“三国”歇后语类隐喻,自然构成该语篇的隐喻网络。但细看起来,例(5)类都跟诸葛亮有关(虽然有的是以刘备、周瑜、司马懿等为主题),例(6)类则涉及曹操。这好似一个大隐喻网络里的两个次(隐喻)网络,各个隐喻之间的关联超过该语篇之外的隐喻,但是,诸葛亮类隐喻和曹操类隐喻的关联稍逊色于某/同一类内部隐喻之间的关联。假如把“三国歇后语隐喻”看成一个隐喻网络,那么,诸葛亮类就构成了经线,曹操类构成了纬线。经纬纵横,加上更细的次类斜线,形成一个迷人的隐喻网络世界。

上文教师节发言语篇也是隐喻网络,全部隐喻都有关联,不过,细看起来,有的属于中国教育这个大主题,有的则属于教师、师生关系、校园、教师节等。假如前者是“经”,后者就是“纬”。后者的细分构成各种缤纷斜线。叶芝的那首诗就是由表示中心和边缘的各种规约隐喻的隐喻网络。如果说社会“非中心化”即边缘化隐喻网络构成了“诗经”,那么社会“重新中心化”以恢复其颠倒的社会秩序的隐喻网络则构成了“诗纬”。其他相关隐喻以及更加细分而获得的隐喻,如感知中心—边缘隐喻,中心部分—边缘部分隐喻,动态中心—边缘隐喻,社会或社交中心—边缘隐喻,道德伦理中心—边缘隐喻,政治外交中心—边缘隐喻,等等,则是贯穿其间的装饰斜线。莎士比亚的第十二首十四行诗以直接服务主题(哀叹光阴似箭,人和物都难葆青春)的关于人和物的隐喻分别为经纬,以其他和其间更细的隐喻次类为斜线,构成一个隐喻网络(分析从略)。

6 结语

本文首先讨论了隐喻产生的机制即隐喻化,以及其反向语用机制“反隐喻化”。其次文章讨论了隐喻和意象、象征的关系。接着我们阐述了散文和诗歌的隐喻网络。不论是创造和使用隐喻还是接受和解读隐喻,都离不开隐喻所在的语篇和毗邻隐喻的互助,只是我们在强调隐喻的语篇性和互相依赖性的同时还指出,一个隐喻网络的经纬线以及左右穿梭、上下交错的(隐喻)斜线,具有不同程度的语篇性和相互依赖性。同属经线的隐喻关联度更高,同属纬线的隐喻亦然。以隐喻的鲜活度而言,在不考虑具体语篇和主题的条件下,活喻的语篇性和相互依赖性高于死喻。

不难发现,任何一个语篇的隐喻网络都是一个由死喻、半死喻和活喻——隐

喻连续统构成的隐喻网络。也可以说,考虑到语篇的历史性和动态性,一个语篇见证了,见证着,也将见证“隐喻化、去隐喻化、反隐喻化”等过程及其三“化”之果。从语篇看隐喻,隐喻和隐喻之间构成了“隐喻性真实”的经纬和网络,反映了施喻者反映意象和象征的“隐喻化、去隐喻化、反隐喻化”的方法、视角、过程和结果。从隐喻看语篇,语篇是静态语词和动态隐喻的对立统一体,而隐喻的动态性表现为死喻不(那么)死,活喻不(那么)活,半死喻或死或活,一切要看施喻者、受众、语境(含语篇语境)等语用因素。

注释

* 本文为四川外语学院和国家社科项目“语用翻译学:寓意言谈翻译研究”(sisu201209, 12BY017)以及教育部社科项目“词汇—构式语用学:语用翻译学的第一座桥”(12XJA740008)的前期成果。

① 语出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转引自张沛(2004: 112)。

② 语出阿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张沛(2004: 114)转引自韦勒[Wellek, 1983 (1981), Vol. 2: 311—312]。

③ 韩非子在《解老》里说的“象”就是“想象”——从“死象之骨”,想象其生,类似的认知思维都是这样的“想象”过程,结果见到的都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

④ “展”是笔者在“语言学理论”课上加的,因为“承”字不足以担当那么大的篇幅和内容。

⑤ 本引语来源于T.S.约翰逊(T. S. Johnson)的网文,题目是“Cleanth Brooks' 'The Language of Paradox'”,网址是:

<http://ezinearticles.com/?Cleanth-Brooks-The-Language-of-Paradox&id=83427>

⑥ 迪恩把三个名字放在一起:Lakoff-Johnson-Turner theory(莱柯夫—约翰逊—特纳理论),可见作者把他们三人的观点视为一脉。

⑦ 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Second_Coming_\(poem\)](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Second_Coming_(poem))

⑧ 第5、15、17节分别讨论了“文化连贯(cultural coherence)、经验的连贯构造(coherent structuring of experience)、隐喻间的复合连贯(complex coherence across metaphors)”,第9和16节讨论了“隐喻(的)连贯”(metaphorical coherence)。

参考文献

- de Beaugrande, R.A. & W. Dressler. 1981. *Introduction to Text Linguistics*. London: Longman.
- Blasko, D. G. 1999. Only the tip of the iceberg: Who understands what about metaphor? *Journal of Pragmatics* 31: 1675—1683.
- Deane, Paul D. 1995. Metaphors of centre and periphery in Yeats' "The Second Coming". *Journal of Pragmatics* 24: 627—642.
- Frye, N. 2002. *The Great Code: The Bible and Literature*. Boston: Mariner Books (division of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 Frye, N., et al. 1957. *Anatomy of Criticis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akoff, G. & M.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koff, G. & M. Turner. 1989.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each, E. 1976.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The Logic by Which Symbols Are Connect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icoeur, P. 1975. *La Métaphor Vive*. Paris: Edition du Seuil.
- Wellek, R. 1983[1981].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Vol. 1—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胡壮麟, 2004,《认知隐喻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刘兵, 2008, 隐喻的语篇性分析,《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6): 79—81。
- 钱锺书, 1979,《管锥篇》(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
- 束定芳, 2000,《隐喻学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魏在江, 2006, 隐喻的语篇功能——兼论语篇分析与认知语言学界面研究,《外语教学》(5): 10—15。
- 2008, 隐喻与文学语篇的建构,《外语与外语教学》(3): 13—14。
- 严世清, 2000,《隐喻、隐喻化与非隐喻化》,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 张沛, 2004,《隐喻的生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张玮、张德禄, 2008, 隐喻构型与语篇组织模式,《外语教学》(1): 7—11。
- 赵彦春, 2011,《隐喻形态研究》,北京:外文出版社。